台大日本語文研究 9
東亞異文化的異化與同化 特輯
頁 1-43

不排斥亦不被吞噬的異文化受容之可能性

平川祐弘 *

摘　要

若以地球規模來衡量，東亞文化不能稱之爲主流文化。在這全球化的時代，旁流文化不受容主流文化而能存續下去是不可能的。再加上人類「如果意欲發展自我的成就，就不應該吝於接受他人的成就。」此時，與其被強制接受異文化，主動地受容異文化顯得更爲重要。在今日的地球村社會中，肯定文化的多樣性及混同性是健康的態度，能跨足多文化的人才需求也會日益漸增吧！

關鍵詞：文化受容、變換中的自我定位、兩腳學者。

*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s it possible to accept other cultures, without excluding them or being subjugated by them?

Hirakawa, Sukehiro *

Abstract

In this age of globalization dominated by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symbolized by the English language East Asia is a minor factor, and we East Asians are obliged to respond to this challenge of the Other. It will be sound if we accept affirmatively “creoleness” of our present-day cultural situation. Men “with two legs” soundly grounded in his own culture and other culture will be needed everywhere in this world society.

Key words: cultural assimilation, changing identity,
scholar with two legs

* Emeritus Professor of Tokyo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異文化の排除でもなく、異文化への隷属でもない受容は可能か

平川祐弘 *

要　旨

地球規模で考えれば東アジアは主流文化とはもはやいえない。傍流文化にとって中心文化を受容せずに生きることはグローバル化の時代に不可能である。それに人間「苟も自己を偉大にしようとする限は、他の偉大を容るるに吝なる筈がない。」その際異文化を強制されるより能動的に受容することが大切になる。今日の地球社会では文化の雑種性や混淆性を肯定することが健康な態度であり、複数の文化に足をおろした人材がいよいよ求められるようになるだろう。

キーワード：文化受容、変動す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
二本足の学者。

* 東京大学名誉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排斥亦不被吞噬的異文化受容之可能性

平川祐弘 著

(蔡暉映 譯)

一、鎖國政策的結束以及與異文化的接觸

在今後的東亞地區，是否可能不受異文化影響而生活呢？不論是建立在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基礎上的中國清朝，或朝鮮李朝、日本德川幕府，在十七世紀、十八世紀、十九世紀這段時間對西方都是堅持著鎖國政策的。雖然西方列強並沒有對東方國家有明顯的侵略行動，但這些東亞國家對於外來的基督教文化心懷警戒，將其視爲懷有暗中顛覆傳統意圖的外來者。如此看來，當時的東亞國家實行鎖國政策是極爲理所當然的自我防衛反應。地大物博的中國不將南蠻、北狄、東夷、西戎放在眼裡也是當然的。對當時的中國而言，實在難以想像在中華版圖之外有文化的存在。

轉觀現在，即便有時間上的差異，但東亞諸國都已產業化，貿易立國成爲各國的重要政策，曾經堅持鎖國的這些國家，都已漸漸投向全球規模的資本主義體制。在所謂全球化的趨勢當中，至今仍維持著鎖國體制的東亞國家僅剩北韓一國了。可見，鎖國政策的結束、國家的開放，同時也意味著與異文化的接觸、共存，進一步更意味著異文化的受容。這同時表示國內社會的國際化。一則以推動多種價值觀的共存，但一則以暗示著金融、商場交易、甚至於通用語言的一元化。國際公認全球標準(global standard)的出現就是後者的極佳例子。且上述的一元化現象不單在經濟、金融領域發生，近來更可見民主主義或自由的理念漸漸以全球規模統一支配著各種價值觀。

全球一元化的推展過程首先起源於各地區在外交、商業、軍事上的接觸。雖然起初異文化接觸或受容的主要媒介爲外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官或商人，但也逐漸的擴散至各領域，其中，大眾傳播媒體更擔當了傳播異文化的有力推手。不單是藉由人與人的接觸，以選舉制度爲例的意識形態影響也不容忽視。採納新制度本身即是文化受容的一種型態。

從人類的層面觀看異文化接觸的交錯點，將能發現人的職業也能夠成爲各樣的媒介。上從元首外交、皇室外交，下至娼妓或過去的奴隸交易。此外，可列舉出留學生、知識份子、學者、神職人員、觀光客或派駐海外的工作者等作爲主動接受外來文化者的例子。不單在於人類層面，書籍、電視、E-mail、商品、機械、食物、乃至於鴉片、麻藥或傳染病，都是文化傳播的媒介。在可成爲善亦可成爲惡的文化接觸或文化摩擦中，到底什麼樣的人才是能夠促使東亞地區的異文化受容成爲有意義的理想人呢？從文化關係論的觀點看來，這樣的人又該具備什麼樣的立場與心態呢？

二、兩腳學者

以下將以日本爲例來探討。在明治・大正年代（一八六八～一九二六），森鷗外（一八六二～一九二二）從全球觀點觀察日本文化並對其未來提出了不偏頗且至今依然適用的看法。森鷗外是在當時深思東亞諸國在全球中的文化定位，並指出日本的未來方向在於intercultural relations中的人之一[1]。作爲文化指導者的森鷗外在一九一四年，向大正時期的新青年們闡述西洋文化值得尊重之處，並曾說「若一個人希望被稱爲偉人，他豈能吝於付出努力接納他人偉大之處呢（苟も自分を偉大にしようとする限は、他の偉大を容るるに吝なる筈がない）」。對

[1] 1884年，森鷗外以軍醫的身分留學德國，也因此1890年代他對文化政策的發言多是關於醫學會方針的。當西方醫學與東方的中醫學有所對立時，身爲西醫的兒子且又是早期留學生之一的森鷗外，堅持西方醫學是唯一有普遍性且優越的。但從森鷗外在1910年代所寫作的《渋江抽斎》等作品可知，晚年的他對中醫學在文化史上的價值有了新的評價。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森鷗外而言，「兩腳學者」是最爲理想的。他說：東亞現今已成爲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交會衝擊之處。日本有許多國學一邊倒、漢學一邊倒、或是西洋某國一邊倒的學者。當然這樣的專家是重要的人才，但單腳東洋學者或單腳西洋學者的意見總是難免有所偏頗。「時代所要求的是兩腳學者，需要的是能夠兩腳各別穩踏在東西兩方的學者。」(《鼎軒先生》)。森鷗外的見解在百年後全球化漸進的今天仍然不失其重要性，甚至可說是更加切身，且不單對日本，更對非西方國家的所有人都是值得深思的。

三、主流文化與支流文化

今日的日本與台灣都擁有繁榮的經濟，但就地理、政治、文化而言，日本與台灣相對於全球都只能算是一個小島國。現今不論在政治、文化、經濟上，世界的主流都是在以英語國家爲中心的西方。我們東亞人必須學習英文，但西方人並不一定需要學習日文或中文。既然這樣非對稱的關係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日本與台灣在國際社會中雖然不至於被稱爲末流，但也只稱得上是支流。我們無法用自國的語言呈述意見並將它強制於外面的世界。我們頂多只能勤練英文等外文，努力使外界能夠聽到我們的主張。

曾經以繁華的中華文明傲居東方中心的中國大陸，亦曾習於將自國的政治意識加諸於週邊國家。即便在今日的中國大陸仍有人追尋著大唐、大明、大清盛世的夢想，但卻再也無法將其實現。的確，在大陸的中國人之間今日依然留有強烈的 Sino-centric 思想，但這種東風壓倒西風的毛澤東式思想即使對中國人聽來極爲順耳，卻也僅是存在於鎖國體制封閉空間內的妄想，是無法適用於現代的。經過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所需求的也是能夠雙腳分別立足於中國及外界的人才。在長達四千年的中國歷史中，中國從來沒有一個時期的精英們比現今更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熱中於學習外語。

事實上，西方諸國應該也同樣地尋求著這樣的人才。但西方世界對非西方世界的動向尚能抱著冷淡的態度。[2] 甚至可說英語的全球普及化有助長英美人對知識怠慢的危險性。[3] 反之，住在非西方的人們若要生存則必須時常注意世界主流文明的動向，並且和它取得平衡。換言之，二十一世紀的西方與東方在文化的力量關係上是不對稱的。由於這種非對稱關係的差異，使得西方雖然沒有接受東方文化的急迫性，但東方卻不得不接受西方文化。同樣地，西方人不一定需要學習東方語言，但生活在這世界，東方人卻不能不學習英語。

四、主動的文化受容與被強制的文化受容

這麼說來，我們應該對異文化的受容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呢？或只需要消極、被動地將身心暴露在異文化的影響中呢？攝取文化就像精神上的食物，有時能夠選擇自己喜愛的接納，有時也可能被外界強逼而不得已地全盤接受。因此，異文化受容的型態有可能是內在的、主動的情況，也有可能是外在的、被動的情況。在殖民地被支配的情況下或軍事佔領下產生的文化接觸、受容或同化就屬於後者。至於其強制的程度則可

[2]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鑒於與外國接觸的機會增多，因此曾在某段時期持續地對外語教育投資龐大的預算。但在教導非西方語言時，美國的語言學習法注重藉由pattern practice訓練如何以外文表達自己意見，而非如何深入對方的想法。以日語爲例，藉由模仿錄音帶而學習的Jordan Method十分有名，也得過各式獎項。但這樣的語言教育雖然有利於幫助美國人以日文表達自己的想法，但卻難以促使他們了解日本人的內心世界。部分語言教師也批評這樣的方法是錯誤的。又，近年來以日本爲研究對象的美國學者的日文能力亦不如戰後的第一代學者。

[3] 由於在美、英、澳的日本研究容易以日文作品的英譯本或英文文獻爲準，因此會有錯誤的觀念如滾雪球般擴大的傾向。這樣的現象就如同學問的自體中毒。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政治色彩過於強烈的中國大陸或韓國的日本研究。研究外國的學者必須時常反省自己的研究是否以對象國家的語言爲依據，藉此向自國的外國研究學者容易陷入的錯誤刻版觀念提出更正。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視被強迫受容異文化的人民是否喪失母語作爲基準。[4] 但事實上，即使在被迫受容的情況下，知識份子依然能藉著主動的、有意識的面對外來文化而將危機化爲轉機。許多生於殖民地但同時保有母文化與殖民地文化的知識巨人就是很好的例子。[5]

不論我們贊同與否，全球化正逐漸的拓展它的範圍。其實，這也可算是一種被強制的文化受容。因爲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難免伴隨著由大文明單向強制的價值觀。在這樣的情況下，既然新形式的文化正逼近我們並迫使我們接受它，除非我們堅決拒絕且背對潮流，否則不論我們願意與否，都將需接納新的文化，並進一步地去尋求它。[6] 即使是難以接受捨棄毛筆改用電腦打字的人，終究還是必須順應時代的需求。雖然這只是個常見的例子，但既然有必要全面接受電腦及其背景文化，在這以全球規模進行異文化受容的時代裡，我們更必須在了解自己所屬的文化的同時，也去了解與自國文化異質的新文化。甚至，進一步還有可能藉著應用資訊科技興起新產業，從而主導世界潮流。既然如此，不畫地自限地滿足於自國傳統文化的兩腳學者的存在更顯得十分重要。

此外，這個兩腳的人若是個能夠由三個相異的角度來綜觀大局更是好。過去，文化的流向是以文化宗主國與文化附屬國之間爲主流。但在文化的輸出國與接收國之間不應只有單向直流的關係，而更期望能夠有所交流，甚至更理想的是在過去彼

---

[4] 在這情況下，母語保存的可能性會依使用同一母語的集團數多寡而改變。又，當母語與支配語言屬於同一語系時，由於容易學得支配語言，因此更容易被吸收同化。至於在歐洲能夠有匈牙利語或巴斯克語的使用者形成獨立集團而存留，根據德永元的主張，可能是由於文法體系的差異阻礙了同化的進行。

[5] 如李登輝先生、辜振甫先生、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泰戈爾等人，殖民地出身的身世也是促使偉人誕生的因素之一。

[6] 也有心理學者（岸田秀）將被強迫接受外來文化者的心理比喻爲「被迫在肉體上必須接受男人的女人」。所謂「日本在 1853 年被美國的 Perry 艦隊『強姦』了」的歷史解釋也由此而來。但既然有日本人認爲鎖國的結束是有益的，那麼這種僅強調片面的歷史解釋方法便令人聯想到「所有婚姻都是男性主導的強姦劇」這種極端女性主義的主張。

國家圖書館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毫無關係的多個文化附屬國之間能夠有所交流。事實上，這樣的可能性也正日漸加增中。在這新時代，若有更多不但熟悉自國文化，同時又瞭解至少兩個異國文化的人，那麼擁有安定的度量衡的人將會增加，能夠迴避對某特定國家有所偏好的一邊倒情形，進而能夠成爲穩定全球社會的因素之一。關於來自三相異觀點的三點測量的意義將在之後補充說明。擁有橫跨美國台灣兩地能力的人即可稱爲兩腳學者；橫跨美國與日本的人也是兩腳學者；橫跨台灣與日本的人也是兩腳學者。但若能夠足踏美國、日本、台灣三地來測量的人更是今後所被需要的。

五、日本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糾葛

在此由歷史的角度對日本人在接受西方文明時的心路歷程稍作概述。

十九世紀的五〇年代到六〇年代，在 Perry 艦隊出現在浦賀後的十五年間，日本主張尊皇攘夷的學者多爲漢學者或國學者。只靠單腳站立的學者們大大闡揚著東方儒家道德思想的優越性及大和精神。不過，一旦幕府維新的志士們以尊皇攘夷的口號對德川幕府提出無理的要求並打倒幕府樹立中央集權政府後，他們很快地將政策轉換爲「開國和親」。這是因爲他們切身的感受到西洋軍事技術的優越性。但到了二十世紀的三〇年代至四〇年代，當日本陷入國家孤立的不安中之後，大和精神的優越性又再次被提起。而這些高舉大和精神的青年軍官或右派的超國家主義者則被稱爲昭和的維新志士。他們鼓吹盲目的愛國主義，也因此就像伊索寓言中不自量力的青蛙挑戰大牛一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綻腹而亡。就歷史事實而言，國際情勢的確是將日本趕入了窘境之中，但導致日本當時瀕臨亡國的主因應歸咎於日本軍方不順服政府統帥並下了錯誤的判斷。很明顯地，這些人所抱持的日本至上主義想法是既不合理又缺乏國際性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九四五年後，日本反省過去狂熱崇拜超級國家主義（ultra nationalism）的歷史，轉而崇尚國際主義，並鼓吹培養國際觀。但，其中卻仍然暗藏著錯誤。雖說是國際主義，卻也可分爲許多種。當然，其中多數是以外國爲基準的。雖然提倡國際主義是出自於期望和平的單純想法，但對不同國際主義的選擇取捨將會產生完全相反的結果。左方也曾有莫斯科本位的國際主義。早從二次大戰前，日本就已經有學者和新聞業者緊抓著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此外，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獻是藉由日文翻譯流通的。這件事情的功過更待今後的研究探討。）也曾有盎格魯撒克遜本位的國際主義。既然今日全球化的本質被稱作爲美國化，近來的全球主義其實也是和它差之不遠吧。另外，更早之前還有以法國文明爲中心的普遍主義。信奉西方基督教本位的普遍主義的人不只在美南地區的「聖經帶」(The Bible Belt)，更存在於海內外。但這些英美本位的國際主義被視爲是維持現狀的體制，且是「擁有的國家」統治「缺乏的國家」，因此日本在一九三三年退出了國際聯盟。

六、對大文明的順從應到什麼程度

是否只要對大文明一律無條件接受順從就對了呢？或是在文化上接受異國的優點與在政治上降服於異國是兩回事呢？抑或文化層面和政治層面是屬於無法分割的一體兩面關係？

綜觀異文化受容的問題，同時也是當兩相異起源的內外文化接觸時，該採取哪一方的價值體系、遵從哪一方的價值觀的問題。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有可能捨棄母語而學習新語言，並全盤接受新的文化體系。主要由移民所構成的美國或澳洲一直以來都認爲與英語文化同化是好的。從非洲被帶到美國的黑人除了捨棄母語接納主人的語言之外別無選擇。不過，並非所有的文化受容都會使接受的一方喪失母語、而斷絕了祖先的文化傳承，在許多例子中也能看到保有母語且選擇性接受外來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化的情況。

但即使是後者這種在維持母語以及母文化的前提下接受異文化的比較和平地被影響的關係中，內部仍有可能對起源於外地的外來文化價值觀產生反彈。過去日本也曾有過這樣的例子。遠離大陸的島國日本除了過去兩次受元寇侵襲未遂的經歷外，並沒有受到中國軍事或政治上統治的歷史。日本一向是自主且選擇性地接受大陸文化的。但即使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卻依然產生了反彈。(日本的謠曲《白樂天》中明顯地能看到作者身處足利時代瀰漫著中國明朝文化影響的京都而對日本人的自我認同感到危機的情感)。[7] 個人認爲幾個過去這樣的例子值得作爲今後在東亞地區異文化受容的先例，並深入思考。在此，將藉由類推的方法，參考過去島國日本從以中國大陸爲主的地區受容文化的實例，考察今後可能發生的全球化時代對西方文化的受容與反彈的可能性。

七、以漢文作為共通語言的昔日東亞

代表強力推廣全球化的西洋文明的語言是英語。而明治後，英語在日本成了第一外語。由於西洋列強同時也是威脅日本安全的帝國主義列強，因此明治後的日本爲了自保而致力於西化。日本與西方這樣的關係在心態上是有所矛盾的。(這種愛恨交織的矛盾心態可以印度爲例。成爲英國殖民地的印度，由於兩國同屬印歐語系並在語言上本是同源，因此印度人民較容易習得英語，使得英語成爲印度知識份子的共通語言。在這樣的地區，對西化愛恨交織的情感是更爲強烈的。)

相較之下，在接受西洋文化之前的日本是以漢文爲第一外語，且漢文普及的程度到了甚至日本人不認爲它是外文的地步。在某段時期，使用讀音順序符號以日語讀出的漢文可說是

[7] Sukehiro Hirakawa: *Japan's Love-H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West* (Folkestone, Kent: Global Oriental, 2005) pp.3-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化爲日文的一部分了。當時在大多數日本人的意識中，漢文與日文的關係並沒有政治・文化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的問題。這與歐洲人不將拉丁文當作是外文是一樣的。在那樣的時代，以漢字書寫的漢譯佛經或儒家經典被日本人認爲是有普遍價值的。當時漢字被稱爲「正字」「本字」,「假名」正如其名地被認爲只是暫時的、假借的文字。這種貶低自國文字的想法支配大眾，因此男人理所當然地使用漢文書寫，而被認爲不需要學術教養的女人則以和文書寫。但即使在這段大陸漢文化與日本和文化的關係沒有政治上支配與被支配的問題且大致看來和平，隨著日本人自我意識的增長，仍舊對大陸文化霸權式的支配產生了反彈。

那麼在這段和平的異文化受容過程中，日本人產生了什麼樣的自我主張呢？又，這是爲什麼呢？

八、日本人自我意識的覺醒：使用大和語言（やまとことば）詠詩

早期，日本人有很長的一段時期並沒有文字。在漢字傳入後的八世紀時，太安万侶使用漢字爲口傳的『古事紀』留下文字紀錄。當時，太安万侶感到日本使用三十一音節的和歌難以翻譯成漢詩，因此使用漢字作爲音標文字，將「八雲立つ（YaKuMoTaTu)出雲八重垣妻籠みに八重垣作るその八重垣を」標記爲「夜久毛多都（YaKuMoTaTu）…」，藉此將部份的日本口傳文學以表音的方式紀錄了下來。使用這種方法的原因也許是由於和歌難以翻譯成漢文，但另一方面也由此可見日本人對日本文化遺產的獨特性及珍貴性有了自覺。

隨著使用漢字作爲表音記號，日本人逐漸發展出以漢字爲基礎的日語表音記號－假名，並且流傳開來。從此，大和語言不單被使用在和歌上，更被廣泛地利用在日記及物語的寫作上。東亞地區的 lingua franca(通用語)是中文，當時日本也與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多的中國週邊國、週邊地區一樣，以漢文書寫公用文書，並且將能寫漢詩視爲是男人文化修養的必須條件。菅原道真(八四五～九〇三)也曾作了模仿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的漢詩。但中文與日文屬於完全不同的語言系統。也因此在十世紀初，紀貫之(約八六八~約九四五)以假名爲《古今集》作序，主張最適合日本人表現自我的方法並非漢詩，而是和歌。以「やまとうたは、ひとのこころをたねとして、よろづのことの葉とぞなれりける」起頭的序文廣爲人知。據說其中使用「やまとうた(大和之歌)」而非「うた(歌)」是因爲紀貫之將「和歌」定位在與被稱爲「からうた」的「漢詩」對比的位置。換而言之，身爲歌人的紀貫之當時已經自覺到，若不使用母語，要充分抒發內心世界是不可能的。將這件事以今日的觀點重新定義，可以說在瀰漫著漢文化的平安朝中期的京都宮廷中，紀貫之對自己身爲日本歌人的自我意識覺醒了。他也留下了用大和語言寫成的《土佐日記》。

當時中國時處晚唐，國家紛亂不已。日本也不再派出遣唐使，反將目光轉向自國文化，對外來的異文化攝取轉爲冷淡，因此和風文化逐漸興盛起來。看來，不論今昔，對外來文化的攝取都有時大時小的高低潮曲線。雖然平安朝時期的宮廷極重視漢詩漢文的教養，但今日被視爲十一世紀日本文學代表的作品卻不是由男人們所作的漢詩文，而是由女人們所留下的和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紫式部的《源氏物語》。艾略特(T.S Eliot)曾強調在英語戲劇作品極興盛的伊麗莎白女王時代拉丁文教養仍被重視的意義。[8] 同樣的關係也能夠套用在平安時期的日本社會吧。據說紫式部是一位擅讀漢文，且精通《白氏文集》、《史記》等書籍的女性。

但紫式部對日本人應具備的教養卻有獨特的見解，在〈乙

[8] "Shakespeare and the Stoicism of Seneca", in T.S.Eliot: *Selected Essays*(London:Faber,1972).pp.126-1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女〉一卷中曾主張「凡人總須以學問爲本，其大和精神方能爲爲世人所器重。(なほも才をもととしてこそ、大和魂の世に用ゐらるるかたも強うはべらめ)」，其大意指的是「具備漢學學問的基礎才能夠充分發揮身爲日本人的精神與力量」。也因《源氏物語》中有這麼一段一方面肯定異文化攝取的益處、另一方面強調應保持日本人自主性的言詞，後世才會發展出「和魂漢才」一辭吧。有趣的是，在上述〈乙女〉一卷中紫式部以辛辣的口吻描繪漢學一邊倒的博學者們，使當時盲目信奉漢學價值觀的學者們被貴族以及女性們嘲笑輕視的情況躍然紙上。然而，雖然日本當時大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但卻沒有像朝鮮、越南那般採用中國的科舉制度。由藤原家族支配的平安朝日本在本質上屬於貴族統治的社會，與重視能力並以科舉制度選出官僚的中國國情相異。

九、日本國學者本居宣長的自我主張：日本人應先學習日本根生土長的大和文化

德川時代的日本在初代將軍德川家康的治理下採用以儒家思想爲基礎的文化政策。藤原惺窩、林羅山等朱子學者的影響力極強，幕府在江戶甚至開設了稱爲昌平黌的學院。德川時代(一六〇三～一八六七)是整個日本歷史中漢學最爲興盛的時代。屬於支配階級的武士們有的成爲行政官僚，有的成爲學者。但即使在這種積極發掘人才的幕藩體制之下，日本還是沒有採納中國的科舉制度。

在漢學如此的興盛的時期，卻有個町人階級出身的國學者・本居宣長(一七三〇～一八〇一)對這樣的情況提出質疑。宣長在學習醫學的同時也研究《源氏物語》等作品，他嘗試以文獻學的方法研究日本古代文化，遂而完成了《古事紀傳》，並主張應排除儒家、佛家思想回歸古道。宣長在《玉勝間・九》中對日本儒學者的批判說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儒者に皇国の事を問ふには、しらずといひて、恥とせず、から国のことをとふに、しらずといふをば、いたく恥と思ひて、しらぬことをもしりがほにいひまぎらはす。こはよろづをからめかさむするのあまりに、其身をも漢人めかして、皇国をばよその国のごともてなさむとするなるべし。されどなほから人にはあらず、御国人なるに、儒者とあらむものの、おのが国の事しらであるべきわざかは。

對日本的儒學者問起關於日本的事物時，他以一句「不知道」回答卻一點也不以爲恥。對他問起關於中國的事物，他則會認爲「不知道」是極大的恥辱，對不清楚的事情也會煞有其事地胡亂回答。這是因爲萬事都過於效仿中國，導致連自己都裝作是中國人，反而將自國當作是外國的關係吧。但我們畢竟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人，身爲有知識的儒學者豈可對自國的事情不了解呢？(現代語譯)

宣長又說，「若提出問題的一方是日本人，則這樣的態度並無傷大雅，但當中國人提出對日本的疑問時，豈能答說『我對貴國的事物非常了解，但對自國並不清楚』。若真這麼回答，對方肯定會認爲，連自國的事情都不清楚的儒學者怎能夠懂他國的事情。」

但德川時代的日本漢學者雖然熟知中國大陸的歷史，對日本的歷史或文化卻是不屑一顧的。這是因爲當時的學問是以中國爲本位的關係。同樣的事情或許也能套用在台灣某段時期的學術狀況。聽說在台灣曾經長期處於以大陸爲本位的學術狀況，導致學生雖然詳知中國大陸的歷史，對台灣的歷史與文化卻是空白的。本居宣長是個被求知慾驅策而對自己的自我認同(identity)有所覺醒，進而探求自己所屬文化的由來的人。但宣長仍有留下忠告，勸人在閒暇時應當適度的閱讀漢文書籍(「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ら国の書をも、いとまのひまには、ずゐぶんに見るぞよき」《玉勝間·二十二》)。同時也警告不可用來自中國的主觀先入爲主的判斷事物。

> 漢心(からごころ)とは、漢国のふりを好み、かの国をたふとぶのみをいふにあらず。大かた世の人の、万の事の善悪是非を論ひ、物の理をさだめいふたぐひ、すべてみな漢籍の趣なるをいふ也。《玉勝間·二十五》
>
> 漢意(からごころ)並非僅意指好裝漢風、崇尚中國。乃指世人不論是非善惡、立定事理等諸事皆以漢文書籍爲基準之事。(現代語譯)

幾世紀以來日本人沾染了萬事以外國爲優並且模仿的風俗。宣長正是告誡知識份子這種尊外卑內的傾向。這種「對中國馬首是瞻」的態度—漢意,也許可以英譯爲 Chinese prejudice,或稱之爲「中國標準的有色眼鏡」。

這種將研究對象國——中國大陸理想化,從而鄙視日本的傾向並不一定來自謙虛謙讓。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儒學者藉由崇尚中國來自抬身價,將研究中國的自己視爲比其他日本人高等的人。同樣地,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西洋學者也藉由推崇西方來表現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知識份子。這種「萬事以西洋爲首」且對此自豪的人在日本的學者以及新聞記者中有許多。例如《朝日新聞》的記者中希望藉由貶低自國而自認是有良心的高級人士的人層出不窮。其實,與其說他們高級不如說只是空領高薪。問題是這樣的信念其實缺乏事實調查的基礎但卻是近乎先驗式地被信奉著,且不論是新聞記者或新聞讀者都共有著這樣的態度。這可稱爲是近代的「漢意(からごころ)」吧。在此「漢(から)」泛指所有外國。

十、回歸神話中的古代

雖然本居宣長的國學來自對儒學的反彈,但他的思想其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十八世紀時在日本儒學者間漸獲勢力的反朱子學派的學問發展有重疊之處。自十七世紀的伊藤仁齋至一八世紀的荻生徂徠的古文辭學，宋儒的理論逐漸被視爲強人所難的獨斷的個人見解，因此排除宋儒思想、多尊重情感與慾望的想法也隨帶增長。他們也將語言表現的樣態作爲理解剖析人類的資料。換句話說，宣長曾主張「作爲一個哲學人，必須先是一個文學人(哲学的人間である前に、文学的人間でなければならぬ)」[9]。這在也可說是將清朝考據學學風應用在日本。也許就像是儒學者們將聖人生活的古代理想化一般，宣長也將日本神話中的古代理想化了吧。宣長在《玉勝間・三十五》如此寫道：

> 又太極・無極・陰陽・乾坤・五行など、ことごとしくこちたくいふなる事共も、ただ漢国人のわたくしの造説にて、まことには其理とてはあることなし。然るに神の御典（みのり）をとくともがら、もはらこれらの理をもて説くなるは、いかなるしれわざぞや。
>
> 如太極、無極、陰陽、乾坤、八卦、五行等看似誇張難懂又繁多的學問，不過是漢國人杜撰的說法，事實上根本沒有這樣的道理可言。連自認爲在自己的主張中排除了朱子學或易學思想的人，卻都還是借用宋學的理論框架來解釋日本的『古事記』等典籍。這是很愚蠢的事情。(現代語譯)

宣長抵拒「漢意」，強調瞭解古代日本人之心的重要性。他認爲，若無法知古意則無法知道理。並主張應虛心研讀文獻。他分析文章的方法極接近法國 Gustave Lanson(1857~1934)所主張並在法國中等、高等教育徹底實施的 explication de texte。不過，宣長又強調真摯的態度才是學問的正道，並勸人尊神祭祀。因此宣長的繼承者中不但有國學者，也出現神道家。強調回歸

[9] 吉川幸次郎解說，《本居宣長集》(《日本の思想》第十五卷，東京：筑摩書房 ，1969 年)，頁 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古道的宣長的主張成爲助長文化國家主義的因素之一。

到底，日本人是否應回歸源自日本民族的神道宗教呢？在一八六八年頒布「神佛分離令」後，明治初年日本所發生的「廢佛毀釋」運動可說是純粹追求神道而引起的一種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運動。也是鼓吹忠於「神道經籍(神の御典)」的運動。這麼說來，先前所述的受容異文化的包容性態度和這種純粹追求日本本質的排他式想法是否根本是難以兩立的呢？

十一、混融文化之國——日本

「既然日本人指的是住在日本列島的人，那麼理所當然應當學習日本古代歷史。」本居宣長這樣的主張是極健全的想法。他又說「學習時不該用外來的歷史觀判斷自國歷史，重要的是藉由閱讀自國的古典文章來瞭解前人的心性」,這也是一點都不錯的。[10]

說到人的自我認同(identity)，也許基本上真是有「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從小看大，三歲看老」的部分，但這並非僵直固定的。是能夠藉由採納異己而產生變化的。日本人曾經採納了來自大陸的漢文化。對日本這樣的過去我並不想大張撻伐說「它被漢文化污染了」,同樣地,對今日的日本我也不想主張「掃出西洋文明」。不過，我對那些被稱爲「中國派」的滿腔「漢意」的日本人感到困惑，對那些只能透過洋製價值觀的濾鏡看日本的、像無根草似的人們也覺得困惑。

我不是一個將理想時代建築在過去歷史中並且夢想能夠復古的人。因此我對目前擁有雜種文化的日本，換言之，對目前廣義說來是擁有克里歐(Creole)式混和文化的島國日本的歷史實情，是採取全盤肯定接受並從中尋求正面因素的態度。在此，

[10]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日本的歷史學界仍有一派勢力堅信以一九三二年共產國際(komintern)主張爲根基的莫斯科產的日本史解釋。此外，在中國大陸被廣爲閱讀的日本史大多是由井上清或與他路線相近的歷史家所寫的著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廣義的克里歐(Creole)式混和文化所指的是中心文化與週邊文化的混和體，在日本列島中這種混融的現象可以在宗教、思想、風俗、表達方式中找到許多具體例。如「神佛習合」思想、「本地垂跡說」、漢字假名混雜文、將音讀訓讀混合的讀法、和食洋食、和服洋服、和洋折衷等，混融現象實在是不勝枚舉。

日本過去曾先後受惠於中國文化及西洋文化。「受惠」是較含蓄的說法，若改說是「文化上隸屬」其實也不爲過。之所以沒有被征服的感覺，也許是因爲島國日本在政治上從未被吞入中華帝國版圖中的關係。朝鮮半島從南到北都從漢字朝鮮文字混雜文中排除了漢字。可以由此窺探出他們的國家主義異常激烈。但由於我本身喜愛擁有多種排列組合可能性的漢字假名混雜文在聽覺與視覺上所帶來的不同感受，因此對鄰國失去漢字朝鮮文字混雜文這件事感到遺憾不已。

我認爲所謂「和魂漢才」的折衷主義有其道理，在日本實施近代化時將「和魂洋才」 標榜爲口號其背後也有一片苦心。如同森鷗外，我也認爲腳跨東西兩洋是很好的。在今日的日本已經沒有主張排除漢字漢語回歸純大和語言的極端人士了吧。我對於受到外來大文明影響而改變的、克里歐(Creole)化的日本是抱持著贊同態度的。在我身爲日本人的自我認同(identity)中也融合了各式各樣的內外因素。

但以下的事情是我必須清楚表達的。就如同日文的文法構造並不因漢字或片假名字彙的增加而有所改變一般，我承認在我骨子中也有身爲日本人不會改變的基本要素。我生於一九三一年。雖然一般認爲那是屬於軍國主義的時代，但自小陪伴我成長的是以《苦兒流浪記(Sans Famille) 》爲首的許多國外的兒童文學作品。可說我是年紀輕輕就經歷外來文化的受容，但由於我是透過日文翻譯接觸的，所以從這方面看來我是個日語人。及至長大成人，雖然我也使用外語寫過許多的文章，但整體而言大半還是以日語寫作爲主。也許正因爲在本質上我是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使用日語的人，因此我能夠毫無危機感的維持身爲日本人的自我認同(identity)吧。[11]

若我們認同上述的文化雜種性或混融性，也就是英文中的creoleness，那麼認同文化殖民地經歷的後殖民地主義將獲得強而有力的立場。過去的人文科學領域一直是以教授學習英國、法國、中國等文化宗主國的文學史或文化史爲主流。即便是美國，在過去談到文學史所指的仍舊是英文學史。這些修養對文化宗主國的人而言固然重要，對文化週邊國的人而言更是必要的。因此日本人過去學習了漢學，當發現漢文化無法滿足近代世界的需求時，則投向學習西洋文化。在二十世紀中葉前，我們所學的外國文學指的是英文學或法文學，更廣泛的論到學問，則所學的是德國的人文社會學問，在二十世紀後半則是學習美國的學問。但今日，保存並學習周邊文化的趨勢正逐漸向全世界拓展著。

十二、變換中的自我定位

當然，在學習週邊文化的趨勢背景中也包含了對以文化宗主國爲中心的單向思考的不耐煩。十八世紀時宣長對漢學的批判就是其中一例，二十世紀後半，則有高舉國家主義的新興獨立國家譴責過去殖民地支配的舊惡，也有來自左派對帝國主義支配的彈劾。但每當新興獨立國家以排他性的國家主義狹隘地看待自國的文化時，議論就會陷入膠著，化爲與游離現實的空洞口號。大戰後的六十年來，人們不斷重複地聽到對過去文化支配大同小異的批判，對這些言詞已經到了感到空虛的地步。在目睹繼文化支配之後的人民民主主義的諸惡或社會主義陣營崩毀的人當中，甚至有懷念昔日的人出現。的確，與其將過去

[11] 或是由於受到外國接納的程度不高，因此我還能夠保有自己身爲日本人的自我認同(identity)？只要每當我使用英文的we時，所意識到的是we Japanese，那麼日本就永遠是我意識形態的歸宿。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體驗全盤否認，不如站在文化殖民地體驗的基礎上肯定文化混融還比較健康。既然異文化受容即使是在主動進行的情況下也仍需付出努力來同化異己，在這過程中必須接納異己的主體也當然需要面對自我的改變。

因此，我們的自我定位是不斷在變化的。只要活著，這樣的改變就不會停止。若硬是想將它固定，那麼將使我們成爲被「自我認同(identity)」的虛擬框架囚禁的人。在偏頗的情報空間中也有人欲將人民的自我定位向某特定方向操作。這就像是要人民在精神上穿上「自我認同」的制服一般。又，活在大文化與大文化的狹縫或週邊的人也會遭遇不得不改變自己文化歸屬的情況。人即使長期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還是會有被強迫接受異文化體驗的一天。這時，重要的是把持自己免於被文化的變動吞噬了。爲了堅持自己的自我認同本質，除了將雙腳落實在多種文化以圖安定之外別無他法。這時，若能夠擁有眺望三個相異文化的視野，則更能夠活用自己的主體性，更靈活地面對這樣的變化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